

This is a repository copy of .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URL for this paper:

<https://eprints.whiterose.ac.uk/99781/>

Version: Published Version

Article:

Davies, Ian orcid.org/0000-0003-4434-9581 (2015) . Academic Monthly. pp. 19-30.

Reuse

Items deposited in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ar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with all rights reserved unless indicated otherwise. They may be downloaded and/or printed for private study, or other acts as permitted by national copyright laws. The publisher or other rights holders may allow further reproduction and re-use of the full text version.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licence information on the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record for the item.

Takedown

If you consider content in White Rose Research Online to be in breach of UK law, please notify us by emailing eprints@whiterose.ac.uk including the URL of the record and the reason for the withdrawal request.

公民参与、教育与应用社交媒体之间的联系

[英] 伊恩·戴维斯

摘要 英国的自由主义、国内共和主义两大传统以及新起的社群主义对公民应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参与都有很大影响，公民应用社交媒体参与的领域主要是政治和道德领域，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有繁荣的现代化、公共机构、社会资本、志愿主义以及参与地点。尽管社交媒体的教育潜在在英国已被广泛认可，但教师却因保守主义的态度或担心被学生网络欺凌而持排斥态度。要想在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建立一种良性循环，首先就要制定合适的政策来确定公民参与的弹性边界；其次是发展可培养学生认知技巧和行动技能的教学法；再次是开展高质量的、专业化的教师培训；最后是加强应用社交媒体促进年轻人公民参与的研究。为进一步开发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关系的潜力，今后的努力重点应放在公民参与目的、地点和实践的相关问题上。

关键词 公民参与 社交媒体 教育 联系

作者伊恩·戴维斯教授，英国约克大学教育系副主任，教育与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12-0019-12

一、导言

公民参与的理念对于维持和发展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公正极端重要；教育的价值也因为个人成长、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一系列因素而不断被强调；而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总是被誉为现代社会成就的符号和极端重要的因素。进而言之，在公民参与、教育与社交媒体之间可能存在紧密的联系。本质上而言，做出这一论断需要几个假设：教育导致公民参与不断增加；公民参与的形式本身是教育性的；社交媒体对于公民参与和教育都有促进作用。对三者关系的论断意味着在三者之间可以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受过教育的人们想要融入社会；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实现这一愿望；通过社交媒体与社会参与的相互作用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并为适应一个优雅的、有前景的社会培养社交技能和陶冶性情。

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很3多复杂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讨论由这一论断所引发的的问题。宽泛地说，我的论点是在社交媒体、教育和公民参与之间可能建立积极的联系。为了证明我的论点，还要辨别许多可能影响我论证的陷阱，我会发展出一个特别的组织框架。然后，我将解释一些关键术语的含义，接着在两个既相互区别又有一定重叠的部分讨论围绕参与和学习的不同视角和相关问题，还会对我认为教育政策制定者、研究者、教师以及其他人们应该做的事情进行推荐。在最后的结论部分，我会尽力厘清从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和教育之间关系的探索中产生的观念和问题属性。

在导言的余下部分，我有必要厘清与本文论断相关的核心概念内涵。如果我能够探讨公民参与、社交媒体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就需要勾勒这些术语的定义和特征。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明确的，但社交媒体或

许是其中最易于描述为：“社交媒体是能让人们互动的相对新的技术形式（主要是但不限于社交网站）。”^①公民参与是一个更有挑战性的术语，但是其初始的、主要的特点可以这样来描述：“公民参与是指参与公共事务，包括参与宪政性事务和非正式的组织性活动等。”^②

“公民参与”这一框架式的说明太宽泛，还需要进一步阐述。我在本文中倾向于围绕着“公共事务”来讨论，这样就可以描述为：

……一个社会生活的维度，有其自己的术语和决策规则……一系列的活动，是（历史地看就是如此）由私人个体、私人慈善机构、私人公司开展的，当然也有公共机构。它是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的概念，与私人利益有原则上的区别；它的核心就是公民身份、平等和服务等价值观……它是……创造各种人类繁荣的空间，无法在市场上买到或在紧密联系的家族社区中找到。^③

最后，作为初始特征描述的部分，我希望参考麦金托什和尤尼斯（McIntosh and Youniss）的说法，他们认为公民参与的本质在于它始终是公共的、合作的，从冲突中产生并作为冲突的一种表达，而且参与总是自愿的。^④我们在后面还会讨论关于公民参与的各种观点。

谈到教育，现在最需要的是简明扼要地说明关于其含义和目的的各种不同观点。史密斯（Smith）认为，宽泛地说有四种关于教育的不同观点^⑤。自由主义教育观强调，只要想到的和说到的都是要学习的核心内容，这个课程就是最好的课程。管理的或者科学教育观则更明显地强调如何帮助青年人学习毕业后生活所需的能力，这一观点十分强调职业的视角。发展的教育观更关注儿童的本质特性，这种卢梭式的路径希望帮助孩子们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最后，史密斯勾勒了一种社会向善论的教育观，看起来似乎是要通过教育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当然，所有四种视角应该结合起来看才合理，从任何单一的视角看似都是完全不合适的。但是有关这些观点的不同特性和倾向性经常在激烈争论之中，这就为观察教育的诸多性质和目的提供了一个透镜。在这四种视角中，社会向善论视角似乎与本文的关系最明显，但所有四种观点都是相关的。

在描述关键术语的这些导语中的最后一点就是要强调参与和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重叠关系。特别是，这与人们学习参与方法的经验证据有关。沙龙（Sharrod）、托尼-普尔塔（Torney-Purta）和弗拉纳根（Flanagan）认为没有简单的、直截了当的发展模式，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问题和不同组织形式之间都存在学习方式的差异。^⑥本文试图在教育、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内在关联上作一个基本论断，但这只是尝试性的，而且还要把握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的需要。

为了知道关于公民参与、教育与社交媒体之间可能实现良性循环的论断是否合理，我现在还需要讨论更多的相关细节。特别需要探索的是公民参与和教育的性质，以及两者各自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这比后文为研究工作推荐的综合性视角更重要，而且更理论性地指明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二、公民参与的不同视角及其与社交媒体的潜在联系

在这一部分，我从四个领域讨论公民参与的性质：那些有助于我们弄清核心结构的各种传统和思想流派；参与的核心领域（主要是道德和政治领域）；那些建构参与以及让我们反思当前活动类型的社会和个人因素；参与的地域性及其影响（例如，考虑地方、国家和全球的视角是否会改变参与本身的性质）。在上述的每一个领域中，我都会评论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

（一）与参与相关的主要传统

①② Davies, I., Bennett, L., Loader, B. D., Mellor, S., Vromen, A., Coleman, S. & Xenos, M., Four questions about the educational potential of social media for promoting civic engagement, *Citizenship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l.3, no.7, 2012, p.294.

③ Marquand, D., *Decline of the Public: The Hollowing Out of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27.

④ McIntosh, H. and Youniss, J., Toward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th, in Sharrod, L. R., Torney-Purta, J., and Flanagan, C. A.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ivic Engagement in Youth*,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pp.23—41.

⑤ Smith, M. K.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encyclopaedia of informal education*, 1996, 2000, www.infed.org/biblio/b-curric.htm.

⑥ Sharrod, L. R., Torney-Purta, J. & Flanaga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hip: a field comes of age, in Sharrod, L. R., Torney-Purta, J., and Flanagan, C. A.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ivic Engagement in Youth*,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pp.1—20.

宽泛地说,能够体现公民参与本质的有两个传统或者学派^①。国内共和主义传统基本上聚焦于我们相互之间的责任和我们国家的责任。与之相反,自由主义传统则强调个人的表达权和免受国家干扰的自由。这两个传统决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实践中真的很难区分某事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责任(例如:作为父母是拥有照顾自己孩子的权利;还是一种责任,如果没有做好就会因为玩忽职守遭到惩罚?)进一步而言,我们有必要考虑:在把握人与国家之间的本质联系时,是否只有国内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例如,关于社群主义(最近在英美以及世界很多其他地方都已经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的争论——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传统;“仅仅”是一个表达权利和责任的背景;和/或是象征着目前存在于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的重点。辨别这些细微特征是有价值的,这样我们就能够去思考哪些可以计划,哪些可以实践。我们可以用这些有关公民参与基本性质与目的的争论来思考社交媒体可以使用的途径。非常宽泛地说,技术既可以用来支持独裁统治,也可以用来支持民主。^②有技术在场的地方就会有监视的社会存在,这很容易从政治家的陈述中找到例子来证明这种可能性。例如,英国前教育部长迈克尔·戈夫对于技术价值曾经这样评论:“技术为我们获得更多数据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就可以知道学校如何管理、教师如何教学以及整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③

对戈夫的评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戈夫的本意很简单而且相当明显,是想要更深入地理解学校事务,但是他的话听起来好像是技术为国家更严格的监管提供了可能性。教育如何为全体公民服务的常识性理解与要承担的责任或者获得的权利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进入了有关公民参与基本问题争论的核心区域。当考虑自由问题时,这些争论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在社交媒体中获取和提供信息(这明显与公民参与的自由传统相关)总是被视为自由的一部分。然而,有时候那些争论也会揭露国家的权力。因社交媒体运用而变得容易得多的信息自由,在西方社会的某些人看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标志。任何允许这种自由的政治家都可能合理后悔自己的行为。托尼·布莱尔^④在描述他在推进信息自由立法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时写道:

你真是白痴。你真幼稚,真愚蠢,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傻子……真的再也找不到词语来形容我这种愚蠢了,无论想象力多么丰富,这都已经够了。我为自己的这种愚蠢行为而发抖。^⑤

最后,与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的联系相关:社交媒体用户中各种群的增长明显与社群主义的理念和实践有关。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的结论是:公民参与的基本理念与社交媒体之间的联系是清晰明晰的。

(二) 参与的领域

公民参与的核心理念与社交媒体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适用于被视为参与领域的地方。当然,我不会尝试讨论参与行为能够发生的一切领域。为了尝试得到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我把这部分的讨论限制在政治和道德领域(这二者在很多国家的教育发展项目中都明显受到主要的、显著的关切)。政治是那种以对财富和整个共同体生存的重要程度来分享权力,从而在给定的规则单元中调节不同利益的活动。^⑥

这个定义强调公民的个人参与是被普遍接受的需要,也建议反对那种可能不支持整个共同体的特定视角。因此,在公民参与的性质上也暗示了某种形式的平衡。在公民教育性质研究方面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政治科学家——科瑞克(Crick),或许诙谐地承认了这种政治领域的动力机制,他建议去寻找“对立面之间的创造性辩证法”,“政治是大胆的谨慎、多样的统一、武装的调和、自然的虚伪、创造性的妥协和严肃的游戏,这是自由的文明所依赖的;它是一个改革的保守者、怀疑的信仰者、多元的道德主义者;它有活泼的节制、复杂的简单、不整洁的优雅、粗鲁的文明和持续的即时性;它让冲突变成讨论;并用人类的尺度给我们设立了一个人类的任务。”^⑦

① Heater, D., *What is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② Morozov, E., *The Net Delusion: how not to liberate the world*, London, Allen Lane, 2011.

③ Gove, M., *Education Secretary Michael Gove speech to the Ofqual Standards Summi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michael-gove-to-ofqual-standards-summit>, 2011, accessed 30 September 2015.

④ 英国前首相(1997—2007),译者注。

⑤ Blair, T., *A Journey*, London, Hutchinson, 2010, p.516.

⑥⑦ Crick, B., *In defence of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lican, 1964, p.21, p.161.

超出这一或许是有意的表面乖张,和政治的复杂性和差异性的认识一样,在我们确定那些有公民参与特点的方式及其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之前,还有一些需要探索的问题。考虑到制度和文化的表现,其中一个问题与“政治”可能意味着什么的限定性因素有关。主张加强公民参与的论点,往往是那些急于通过立法来正式制裁政治游行的政策制定者提出来的。在很多国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想方设法确保选民投票率处在高水平。而且关于这种公民参与的有限形式还受到技术性措施的推动,例如社交媒体战役、电子投票等等。但是政治可能看起来更为宽泛,而且还存在一些促进政治素养的措施,通过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与政治的核心概念如权力、权威和公正等联系起来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观点总是与下面所说的政治一致,而且与女权主义、政治认同包括文化多样性问题联系在一起。例如,奥斯勒(Osler)把科瑞克报告解释为制度种族主义的例证,她认为这一报告未能对多样性的基本概念特征和文本特征予以足够的注意。^①在这些争论中,很多与政治是公共的和/或私人的问题相关,而且这与社交媒体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一些作者(如Papacharissi)认为社交媒体可能要为模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负责。^②目前存在两种可能性:公共与私人的区别仍然存在,而社交媒体可以在这两边运作;或者,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区别正在减少,而社交媒体可以补充识别和开发这一新环境的途径。

围绕着如何描述道德特征这一问题,也存在同样激烈的争论。实际上,无论是在理念上还是教育发展项目上,政治与道德之间都有着明显的联系。例如,科瑞克主张“政治是在公共空间中实践的伦理”。在这个领域中,社交媒体的使用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偶发事件。技术运用的伦理极端复杂,而且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引人注目。因此有一些真实存在的问题无法回避,这些问题有着巨大的教育潜能,部分是通过它们与日常生活的联系而获得了动能。我们可以通过探索一些基础理念的方式来建立一个更好的抓手,以确定如何应对社交媒体中的新元素。桑德尔(Sandel)通过参考哲学家如边沁、康德和罗尔斯的著作来勾勒实现公正理念的不同路径。他攻击功利主义(把功利或者福利最大化,或者寻求最大数量的最大快乐)的理念,认为这个学派的思想存在显著的缺陷。桑德尔认为功利主义把公正和权利变成一种计算而不是道德准则,用把所有的人类商品都转换成一种统一的价值计量的方式来取悦商品,没有考虑它们之间有质的区别。当说到他所谓的自由基础理论时,他解释说,无论人们在自由市场(自由论者)所做的实际选择形式,还是在原初的平等状态可能做的假设性选择,都有关于公正的考虑。他发现这两者最终都没有说服力。他认为,尽管这些理论都是道德准则的表达,如:它们不会要求我们去追问或者挑战我们的偏好。按照这些理论,我们所追求的终极道德价值,我们所引领的生命的意义和象征,以及我们所分享的日常生活的质量和特征,都存在于公正的统治之外。^③

桑德尔看起来更倾向于那些有利于培养美德和思考公共利益的理论。他提出建议:

一个公正的社会不能通过简单地把功利最大化或者保障自由选择权来实现。要实现一个公正的社会,

我们不得不一起来思考良善生活的意义,并创造一种对不同意见持友善态度的公共文化。^④

这种观点当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在宣称什么是良善生活以及应该或者必须做什么之后,那些通过反思其真理观而获得知识连贯性的哲学家一般就不再起作用了。相反,接下来应该是那些有能力劝说他人的个人或团队来提出其合适的解读。政治作为“对立面之间的创造性辩证法”(请参见前文)的性质,与确需识别并发展出一种公正的实体形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紧张关系。为了思考与本文相关的紧张关系,我们要确保这些基本概念和原则安置在那些影响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和教育的社会及个人因素的上下文中。它可能是这种情况:桑德尔对公共考虑的偏爱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的社会中可能更容易实现。

(三) 影响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和教育的社会及个人因素

如果公民参与能够发生,那很可能有特别的理由。如果我们希望在这种参与中实现教育潜能的话,那么人们会参与哪种类型的活动,哪种类型的人们会参与,这些都需要讨论。阿姆娜和泽特伯格(Amnå and

① Osler, A., The Crick Report: difference, equality and racial justice, *The Curriculum Journal*, vol.11, no.1, 2000, pp.25—37.

② Papacharissi, Z.,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③④ Sandel, M. J.,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London: Allen Lane, 2009, p.261.

Zetterberg) 指出了对促进参与有影响力的四种社会性因素。^① 首先, 他们指的是被他们主要解释为繁荣的现代化。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 他们可能想更多地说那些资源是怎样使用的, 他们更有能力获得让他们参与的技术性装备。这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应用得很好。智能手机和其他类似物品相对昂贵, 仅适用于现代社会。一旦购买(这本身就是一种参与行为)了, 那些手机和电脑就成为参与的潜在工具, 通过这些工具做出的评论包括了私人 and 公共事务, 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运用的这种混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是合理的。阿姆娜和泽特伯格讨论的第二个因素是公共机构假说。换句话说, 政治体制是否允许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流? 有时会有个人与官员们进行自由沟通渠道的实验, 不难想象, 这有时会被证明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这种困难的性质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阿姆娜和泽特伯格提到的第三个因素, 社会资本假说。从本质上而言, 这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社交媒体运用的水平和类型显然是与教育相关的。约翰森和约翰森(Johnson and Johnson)曾经提出, “因为社会运用的技术性质影响到社会的现在和未来, 那些没有技术素养的人将会落伍。”^② 如果公民参与不想成为仅属于精英的事情, 那就要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有访问和发展社交媒体的技能。然而, 社交媒体的使用水平并不总是让人放心。虽然很容易想象现在每个人都能够使用社交媒体, 或者那些不能使用的少数人只是老一代, 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 英国 2008 年的一个调查发现, 在拥有 16 岁以下孩子的家庭中有 24% 不能在家中上网。^③ 不过, 英国的网络使用率在增长:

与 2012 年相比, 现在不使用网络的人更少了, 只有 12% 的人说他们在家不能上网而且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不打算在家上网。2012 年的这一比例为 15%。在 16—44 岁的人中有十分之一在家不能上网,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打算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开通。相较之下, 几乎所有 55 岁以上不在家上网的人群(55—64 岁占 20%, 65—74 岁占 37%, 75 岁以上的占 75%) 都不打算在未来的 12 个月内开通(各自的比例是 15%, 30%, 59%)。^④

特别是与社交媒体使用相关的数据已经有明显的增加。

三分之二(66%)的在线成年人说他们有一个当前的社交网站个人主页, 自 2012 年以来没有变化(64%)。几乎所有拥有当前社交网站个人主页(96%)的人都有一个 Facebook 账户, 尽管只有一个 Facebook 个人主页的用户从 2012 年的 53% 降到了 2013 年的 43%。十分之三的社交网站用户说他们拥有一个 Twitter 个人主页, 五分之一的说他们有一个 YouTube 个人主页, 拥有 WhatsApp 个人主页的占 20%。社交网站总体上仍然是一种流行的消遣方式, 60% 的用户每天至少浏览一次, 这比 2012 年的 50% 有了明显的增加, 其中 16—24 岁的用户有 83% 这么做(2012 年的相应比例是 69%)。^⑤

显然, 社交网站的发展在全球各地会有所不同。据估计, 全世界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几乎达到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到 2017 年将有 25.5 亿人使用社交网站。^⑥ 这当然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一个相当陈旧的判断: “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访问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存在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因素持续形成的。”^⑦ 然而, 社交媒体使用得过多以至于:

有迹象表明, 锚定在博客和社交网站的公民参与形式能够改变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长期模式。^⑧

当然, 我们不仅要考虑已经获得的设备, 还要反思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当我在下面更明确地考虑教

① Amnå, E. & Zetterberg, P., A Political Science Perspective on Socialization Research: young Nordic citizens in a comparative light in Sharrod, L. R., Torney-Purta, J., and Flanagan, C. A.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ivic Engagement in Youth*,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pp.43—65.

② Quoted from Rennie, F. and Morrison, T., *E-learning and Social Networking Handbook: Resources for Higher Education (2nd edit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3, p.13.

③ Curtis, Poorest families may receive free lap taps to close the digital divide, *The Guardian*, June 28, 2008, p.12.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08/jun/28/children.socialexclusion>.

④⑤ Ofcom, Adult's Media Use and Attitudes Report, London, Ofcom, 2014. http://stakeholders.ofcom.org.uk/binaries/research/media-literacy/adults-2014/2014_Adults_report.pdf, p.7, p.5.

⑥ Emarketer, Social Networking Reaches Nearly One in Four Around the World – See more at: <http://www.emarketer.com/Article/Social-Networking-Reaches-Nearly-One-Four-Around-World/1009976#sthash.6GyswEh8.dpuf>, 2013, accessed 16 July 2015.

⑦ Selwyn, N. & Gorard, S., Reality bytes: examining the rhetoric of widening educational participation via ICT.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34, no.2, 2003, pp.169—181.

⑧ Aaron Smith etc., The internet and civic engagement. <http://pewresearch.org/pubs/1328/online-political-civic-engagement-activity>, 2009.

育时会做更详细的讨论,但是现在值得注意的是本尼特、威尔士和兰克(Bennett, Wells and Rank)的观点:

就算是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些富有经验的大学生也不能自动地知道博客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参与博客,或者即使态度很积极也未必知道如何有效地参与。^①

阿姆娜和泽特伯格的公民参与思考框架中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方面是志愿主义。志愿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在很多国家都很强,有时是在社群主义的幌子下,在有些地方则与儒家的和谐理念或者社会主义责任相关,还有可能在西方的特定语境中国家权力的表达被新自由主义的成本削减措施弱化了。当然,这些理念和实践非常直接地应用于社交媒体的使用之中。没有人强制性地要求使用社交媒体,关于使用方式的规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限的甚至完全缺席。因此自由参与的性质还需要探讨。在任何社区的参与都可能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事情,而且与前面已经探讨过的准则相关,因此考虑黑特(Heater)的观点很重要:

社群主义对社区感情和责任感的关注脱胎于共和主义传统,尽管在其计划中遗漏了直接的政治参与部分。有些人也许会争辩,核心的共和主义者关心自由这一点至关重要。^②

这一问题十分复杂。黑特要提高据称是自由创造社区的可能性,但参与活动的实际表现根本上超越了制度主义政治学,而且成为了社会强制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关于强制的关切可能涉及到微观参与的理念,微观参与可能聚焦于利己主义的范围,这种参与可能正在增加;微观参与的对立面是宏观参与,主要是集体性的,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这种参与可能正在下降。但影响这些问题的理念并不明确,可能只有参与的特定形式才可能被认为符合所谓志愿主义的要求。例如,为一个公认的慈善机构做无偿工作可能被公认为志愿服务,为补贴家用而工作或者为一个学校活动中的家庭成员做翻译看起来就不同了。志愿者活动的结果对个人和社会都有积极的好处,这是被广泛接受的,这不仅包括培养理解、扩大社交网、学会技巧等方面,也包括更普遍地允许在社会上做好事。但有可能在参与中达到这些目标的人主要是已经有社会地位的人。安德鲁斯(Andrews)认为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年轻人不如社会地位更高者那样积极参与。^③泰勒斯(Taines)也认为,当学校鼓励学生参与时,那些受益最多的人是已经被证明有参与能力的人。^④因此,新的公民参与并没有实现,只有那些已经参与的人获得了一次不同的参与体验。当他们参与活动,要考虑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弗洛普(Fülöp)做了很多工作来探索创意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在那些看似合作的人和看似竞争的人之间。^⑤人们为了获得竞争性利益而合作的方式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讨论。^⑥当人们用社交媒体时,谁要做什么(怎么做)的性质并非显而易见。用户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社会也可以有选择地施加压力。要在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建立一个简单联系是不可能的。

关于公民参与的性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考虑,这就是看起来似乎没有必要讨论但又有点问题的参与地点问题。从实际发生的情况来看,参与很明显都是在某个特定地点发生的。然而颇具争议的是,社交媒体不在任何一个地点发生,却又真实存在。而且当社交媒体运用真的在同一地点或者不同地点的人们之间发生时,参与的类型又存在问题了。许多交流产生于地理上紧密邻近的朋友或者其他人与人之间,于是参与活动可能伴随着物理上的接触。社交媒体经常被用来安排面对面的会谈,或者讨论私人性或者地方性问题。当公民(至少是在正式意义上)与一个民族国家相关,或者在欧盟和跨国空间的语境中,地理边界和公民参与就有很密切的相关性。公民的定义和国籍是竞争性的,一个人是否可以在国家边界内外使用社交媒体,

① Bennett, W. L., Wells, C. & Rank, A., *Young citizens and civic learning: two paradigms of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8, p.24.

② Heater, D., *What is Citizenship*,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77.

③ Andrews, R., Civic engagement, ethnic heterogene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areas: evidence from England,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44, no.3, 2009, pp.428—440.

④ Taines, C., Intervening in Alienation: The Outcomes for Urban Youth of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activism, *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vol.49, no.1, 2012, pp.53—86.

⑤ Fülöp, M., Ross, A., Pergar Kuscer, M. & Razdevsek Pucko, C.,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schools. An English, Hungarian and Slovenian comparison. In F.Salili., R.Hoosain (Eds), *Research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Vol 6: Cultur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A Multicultural Perspective*, Greenwich, CT: InformationAge Publishing, 2007, pp.235—284.

⑥ Kirshner, B., Introduction: Youth Activism as a Context for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51, no.3, 2007, pp.367—379.

都会对参与本身的含义有影响。科瑞克（Crick）引用阿伦特（Arendt）的话强调：“公民是通过单个公民之于群体的角度来定义，如同单个国家之于群体那样。”^①通过这种方式，他有效地强调了民族国家在落实公民权利性质的性质与表达上的积极作用。在公民的国际和全球理念的价值方面，他也把自己卷入了具有挑战性的争论中。全球公民可能在性质上与国家公民有很大的不同。^②行动主义——与作为公民和公民参与的不同形式——超出国家边界的有三种相互关联的趋势：

国家、政府官员和非国家行为者之间关系的水平密度在增长；国家以下、国家和国际水平之间的垂直联系在增长；邀请跨国行动并促进非国家、国家和国际行为者形成网络的正式和非正式架构在增强。^③

这种参与形式与那些争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民族国家之内或者之间——例如在阿拉伯之春已经发生过的。那些运动与社交媒体使用相关的事实，对于我们考虑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也极端重要。

在本文的这一部分，我探讨了公民参与的性质及其与社交媒体的可能联系。我认为这些联系的潜能非常大。公民参与的关键要素与社交媒体的使用有关。下面，我要探讨在教育与社交媒体之间是否也有同样强的联系。

三、教育与社交媒体之间的潜在联系

公民参与的性质及其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可能联系必须结合教育作进一步讨论。从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讲，如果我们要促进公民参与的话，教育显然是必要的。我们需要避免这样的说法（因为学校在实践中经常这么做）——参与不需要教，而且社会的新发展已经超出学校能够教育的范围。对我而言，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提出的基本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他说：

我们不学如何读书或写作，不学骑马或游泳，仅仅被告知怎么做；但通过这样做，受欢迎的政府就能通过小范围的实践，让人们学到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去练习。^④

但是教育接受社交媒体吗？最近的研究表明，尽管在学校里有些好的工作基础，但是关于社交媒体之教育潜能的华丽辞藻与其实际运用之间是分离的。作为社交媒体在教育领域的支持者，本尼特（Bennett）警告在哪些工作构成了公民参与这一问题上还有模糊性。他提出，这种模糊性包括：

声称视频战争游戏和流行文化粉丝网站从某个角度看都是公民的，与青年参与网站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强烈信念是相等的，因为它们的环境能给青年提供他们需要的各种公民体验。^⑤

贝尔达伦（Beldarrain）注意到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过渡到在线交流推动者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或许被认为是夸张的修辞放进更广阔的视野中，来反思建构主义的两大原则：学习是建构知识的一个积极过程而不是得到知识；授课作为一个过程包括对那种建构的支持而不是交流知识。^⑥但由于有关社交媒体教育潜能的辞藻太过华丽，相应的教育实践可能相当弱。有时，按照前面已经提到的新技术已经普遍存在的论述，关于这种缺席的抗辩理由看起来相当古怪。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中，一位教师对于没有使用社交媒体做出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甚至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网络访问权限。因为在学校里，在这栋大楼里，我们没有无线网络，我们要穿过这儿到那栋楼去做。我们没有钱买便携式电脑和那一类的东西，所以现在

① Crick, B., *Essays on Citizenship*, London: Continuum, 2000, p.137.

② Davies, I., Evans, M. & Read, A., Globalising Citizenship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and “global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vol.53, no.1, 2005, pp.66—89.

③ Tarrow, S.,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

④ McIntosh, H. and Youniss, J., Toward a Poli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th, in Sharrod, L. R., Torney-Purta, J., and Flanagan, C. A.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in Civic Engagement in Youth*, Hoboken: John Wiley and Sons, 2010, p.23.

⑤ Bennett, W. L., Wells, C. & Rank, A., Young citizens and civic learning: two paradigms of citizenship in the digital age, Center for Communic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8.

⑥ Beldarrain, Y., “Distance education trends: Integr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foster student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Distance Education*, vol.27, no.2, 2006, pp.139—153.

它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看到它起作用的唯一方式可能是家庭作业,但再说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学生在家都有电脑。因此对这几个小的障碍我们不得不……看那……但我真的接受……^①

这种技术的看似缺乏可能隐藏了其他的原因。可能出于简单的保守主义态度,教师不愿意接受新的教学方法。我们知道教师运用信息技术(IT)进出信息库(如定制数据库),作为幻灯片制作工具(如交互式电子白板),在库里(如使用投票装置)-库外-在教室(如视频会议)从事相关工作。^②但只有其中的部分实践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为预期的教育革命提供例证。开放式问题和快捷方式作为信息技术的应用成果,可能带来浅薄的问题,还可能导致教师过多“背诵脚本”。^③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学生用手机就会缺乏纪律性。对一些老师来说,学生使用社交媒体导致他们感到自己被欺凌。克里亚科和瑞因(Kyriacou and Zuin)的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在世界各地都可能以让教师感到威胁的方式使用。^④

在社交媒体的应用上也可能存在安全防范的问题。一个教师评论道:

你知道我们的很多学生都有手机,很多,他们能用拍照手机把他们所做的事情拍下来,用邮件转发,把照片打印下来……或……你知道,如果你需要什么快速研究,他们能用他们的智能手机……你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不愿……至少中学的六年级学生或者17-18岁大的孩子们才能这样做,但是我们真的不希望那些最年幼的学生在课堂上沉浸在手机里……^⑤

教师们不愿意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也有一个更广泛的职业原因。老师们在最近的一个研究项目中告诉我们,如果教师正在处分学生的视频在公开网站被看见的话,会对学校声誉造成潜在伤害。一个老师认为,14岁的女孩子们看不到的问题对于成人而言却显而易见。

我认为我们老师对它(社交媒体)非常警惕,考虑到边界问题,你知道作为一个老师与学生一起用社交媒体,校内与校外的边界就模糊了,我想我永远不想在脸书(Facebook)上与学生做朋友,即使你知道……我们的所有学生都有一个电子信箱,如果我必须与学生联系,我总是用电子邮件,你知道这是学校时间,因为我知道社交媒体就即时反应而言很棒……作为一个老师,我得对那种联系保持警惕,与学生的联系,你知道……^⑥

在前面的讨论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被揭露出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设想,社交媒体在教育环境中会被接受,以帮助学生理解并培养与公民参与相关的技能和气质。在这一部分,我的结论是:识别公民参与和社交媒体之间的联系面临的相关挑战或许至少与建立教育与社交媒体之间的联系一样显著。根据这一判断,要实现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的积极潜能,考虑要做哪些事情就很必要了。

四、要做哪些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在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建立真正有价值联系的可能性,就要采取一些特别的、具体的行动。我们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在几个显然需要探索的行动领域中,我要推荐的是政策、教学法、教师教育 and 研究。

说来古怪,自由主义者,也可能是自由论者,认为社交媒体的性质与公民参与的弹性边界,意味着讨论政策发展是很有挑战性的。科布和埃尔德(Cobb and Elder)表明,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存在着对于政策制定(这是一个从范围广泛的参与者到公共机构的输入系统,政策制定者根据自身的优先权决定议程)的不

①⑤ Davies, I. & Sant, E.,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England about how social media are used (and how they could be used) in schools and elsewhere, *The Networked Young Citizen: social media,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civic engagement*, Loader, B., Vromen, A. & Xenos, M. (eds.). Routledge, 2014, p.151.

② Moylan, K., *Building Innovation: Learning with technologies*, AER 56, Melbourne, ACER Press, 2010. (also see <http://www.acer.edu.au/aer>)

③ Smith, F., Hardman, F., Higgins, S., The impact of interactive whiteboards on teacher-pupil interaction in the National Literacy and Numeracy Strategies,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32, no.3, 2006, p.455.

④ Kyriacou, C. & Zuin A., Cyberbullying of teachers by students on YouTube: challenging the image of teacher authority in the digital age, *Research Papers in Education*, 2015, DOI: 10.1080/02671522.2015.1037337.

⑥ Davies, I. & Sant, E.,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England about how social media are used (and how they could be used) in schools and elsewhere, p.152.

同观点。^① 现在存在着一种公民参与政策制定的期望,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的形式。为了探索那种参与的可能样态,就需要考虑不同层次的政策制定:地方的、国家的和超越国界的(只要有可能,因为国际法很少)。政策可能以官方认可的形式来表达:所做的或者所鼓励的经常(并不总是)看起来像政策。在这些使政策具有特点并有助于促进参与的不同方式中,社交媒体似乎能够起到一定作用。这种政策制定和发展的合作性质与社交媒体的交互性是一致的。现在需要做的是明确宣布一个广泛的原则框架,以此来强调参与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中心方向可能是与有意的局部实验以及认识不断发展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简而言之,社交媒体的特定使用形式可能给政策的发展和贯彻带来很大益处。

与一般认为的好教学实践相关,教师们应该知道有效的教学法和公民参与实践是什么样子,而且能够与学习者进行交流。他们应当能够促进反思和交流活动,把学生的心思集中在活动的主要目的上,帮助学生详细说明他们的立场并证明其合理性,并让他们去识别好的工作。如果学生被恰当地认可为学习过程的一部分,他们应该:

相信在自己与管理社会的机构之间存在一种交流关系。^②

这可能意味着学生能够发展出认知技巧(例如,有能力去批评、综合、评估、判断)和实践的行动技能(例如,交流、组织、劝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通过社交媒体的教育用途(至少部分地)使好工作成为可能^③,而且这一成功直接与公民参与的问题相关:

SNS 能够在很多方面增加学生的社会资本,例如在同辈支持小组和学习环境方面,以及在他们中间增强黏合和团结。这些可能性应当在教育环境中得到更好的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学生的福利、参与研究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学习的成功……^④

为了让教师们的工作做到最好,开展高质量的教师培训的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了。我在提出这一论断时很谨慎,因为对于什么构成高质量的教学有着很不同的观点(是达到好的考试成绩呢,还是实现了个体的创造性潜能,或者是别的什么),而且要尝试把教师培训与学生的产出(学习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弄清楚实在太复杂。然而,大量的研究显示:精心组织的、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是有成效的。^⑤更特别的是,有证据显示通过社交媒体可以为教师教育项目做积极的工作。^⑥教师教育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意义广泛的进步,考虑到很多国家正在进行的革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师的专业发展正处于某种转折点上。在教师教育的各类工作中,达林-哈蒙德和列勃曼(Darling-Hammond, & Lieberman)在洞察教师教育存在的不同压力的性质方面做得很有价值。^⑦很可能教师教育已经把它自己变成了一个公民参与点,而且进入这一专业的路线数量在增加,其中一般由技术尤其是社交媒体操控的部分会增长。

上述所有的发展应当有研究的根据支撑。早期的研究仅仅在年轻人的技术运用和为年轻公民表达自我

① Cobb R. W., Elder C. D.,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genda Building*. Allyn and Bacon, Boston, 1972.

② Coleman, S., Morrison, D. E., & Svennevig, M., New Media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no.2, 2008, p.772.

③ Vikneswaran, T. and Krish, P. (in press). Utilising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o improve writing: a case study with 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DOI:10.1080/1475939X.2015.1030441; Uusiautti, S. and Määttä, K., I am no longer alone—How do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ive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vol.19, no.3, 2014, pp. 293–305; Vashø, K. B., Silseth, K., and Erstad, O., Being a Learner Using Social Media in School: The Case of Space2cre8.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vol.58, no.1, 2013, pp.110–126.

④ Uusiautti, S. and Määttä, K., I am no longer alone—How do university students perceive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vol.19, no.3, 2014, p.293.

⑤ Cordingley, P. and Bell, M., Understanding what enables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ventry, Centre for the Use of Research Evidence in Education (CUREE) and Pearson School Improvement, 2011.

⑥ For example, Wilson, G. & Stacey, E., Online interaction impacts on learning: Teaching the teachers to teach online,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20, no.1, 2004, pp.33–48.; Goodyear, V. A., Casey, A. and Kirk, D., Tweet me, message me, like me: using social media to facilitate pedagogical change within an emerging community of practice, *Sport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19, no.7, 2014, pp.927–943.

⑦ Darling-Hammond, L. & Lieberman, A. (Eds.), *Teacher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NY: Taylor & Francis, 2012.

而设计的数字媒体方面提供了相当广义的结果。^① 这些研究可能低估了年轻人的公民活动, 仅仅聚焦于选举, 但对年轻人的日常政治表达、参与主题性运动的情况或者他们的同辈讨论观测不够。根据社交媒体支持或者妨碍年轻人公民参与活动的方式, 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在此过程中应当进行何种教育。在运用社交媒体收集和分析数据的研究方面, 也同样有发展的潜力。一些研究者开始提到:

围绕着道德同意和道德溯源等复杂的伦理两难问题, 与儿童一起工作, 以及非法的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教育研究者已经面对的, 但是文献在这些方面很少有具体的指导。^②

如果我们要促进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的良性循环, 上述内容就是对可能要做什么的简要说明。但因在本文中提出了很多问题, 明确潜藏在行动表面之下的问题也很重要。在接下来的结论部分, 我会试图澄清其中的一些问题, 以便对公民参与、教育和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有更扎实的理论把握。

五、社交媒体、公民参与和教育可能存在的理论新路向

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和教育之间关系的潜力似乎从一开始就是显而易见的。健康的社会是这样的: 参与与行为不时发生,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断利用社交媒体的教育形式鼓励这种参与行为, 这种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本身就是公民参与的一种表达。然而, 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连贯框架, 上面揭示的复杂问题还需要进行复查。在这部分, 我要提出需要被定位、追问和提出建议的核心问题。我认为在公民参与问题上还有三个领域的问题需要澄清: 目的、地点和实践。

(一) 公民参与的目的

公民参与的目的本质上是与核心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表达——而且被驱动——我们对于为什么而参与的理解。我想提出的是: 我们为个人和特定群体考虑所理解的权利和责任、公正、多样性, 将有助于我们描述参与的特征。但是这样的身份识别对其本身而言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并举例证明我们所理解的核心概念。有几位作者已经讨论了参与的类型和目的, 包括约翰松和莫里斯 (Johnson and Morris)^③、维斯塞门和卡内 (Westheimer and Kahne)^④、魏格乐 (Veugelers)^⑤。这些构架, 宽泛地说, 聚焦于参与是保守的还是变换的。根据这些不同的目的, 有关政府在促进公民参与中的角色问题就提出来了。政府把自己卷入公民参与活动是否恰当, 这一问题值得令人深思。^⑥ 一般而言, 我会说公民参与的目的应该始终主要集中于教育问题, 桑德尔对功利主义缺陷的评论和自由基础理论应当得到认可, 因为这对于实现一个优雅而公正的社会很必要。简单地以资源有效配置来实现最大化生产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只能强化不平等, 还有更多事情会陷入险境。尽管需要持续的哲学性和经验性反思, 公民参与的目的还是应当被明确地宣示出来。这样, 就有机会开展能推动进步的学术性和专业性反思。弗莱雷 (Freire) 的格言说: 教育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总是为解放或者驯化提供一个好的思想和行动指导。^⑦

① Dahlgren, P. Re-configuring civic culture in the new media milieu, in J. Corner and D. Pels (eds) *Media and the Restyling of Politics*, London: Sage, 2003;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Van Zoonen, L., *Entertaining the Citizen: when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converg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Kann, M.E., Berry, J., Grant, C. and Zager, P., 'The Internet and You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irst Monday*, vol.12, no.8, 2007.

② Henderson, M., Johnson, N. F., and Auld, G., Silences of ethical practice: dilemmas for researchers using social media,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vol.19, no.6, 2013, pp.546—560.

③ Johnson, L. & Morris, P.,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 Journal*, vol.21, no.1, 2010, pp.77—96.

④ Westheimer, J. and Kahne, J., What kind of citizen? The politics of educating for democracy,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vol.41, no.2, 2004, pp.237—269.

⑤ Veugelers, W., Creating critical-democratic citizenship education: Empowering humanity and democracy in Dutch education, *Compare: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37, no.1, 2007, pp.105—119.

⑥ Osler, A., The Crick Report: difference, equality and racial justice, *The Curriculum Journal*, vol.11, no.1, 2000, pp.25—37; Biesta, G. & Lawy, R., From teaching citizenship to learning democracy: overcoming individualism in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 vol.36, no.1, 2006, pp.63—79; Bryan, A., Band-Aid Pedagogy, Celebrity Humanitarianism, and Cosmopolitan Provin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Wankel, Charles and Malleck, Shaun (eds.) *Ethical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of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ocio-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s*, Hershey, PA: Business Science Reference, 2012, pp.262—286.

⑦ Freire, P.,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Education, 1972.

（二）公民参与的地点

公民参与的地点始终是描述参与活动特征的一个关键方法，不仅包括参与活动在哪里发生，也包括参与的活动是什么类型。“公民参与”这一术语说的就是某个政体的一个成员，而且意味着它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前文曾经引述的科瑞克关于民族国家象征的观点很重要。我们正式珍藏的权利和责任主要来源于个人的民族国家。全球公民身份的建构没有那么正式，而且通常来看更多是作为一种态度或者意图的反思。^⑧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最经常使用的地方是本地（而且常常是社交用途）。的确，社交媒体的使用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而且最明显的是被国家政府限制；但是交流从理论上而且经常从实践上都是无边界的。这会对实施前文所说的自由基础理论带来风险。但更积极的是，感觉是为公民参与创造了一个新空间，相关的公民参与活动并不总是受到地理边界或者国家行为的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这可能影响到公民参与的性质：

当投票率揭晓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政党成员的活动和其他更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进入了一个向下的螺旋中，公民参与的方法创新在大多数自由国家似乎进入了一个上升期。^⑨

而对于下述的凯立德和梅杰（Calende and Meijer）的论断就要谨慎对待了：

互联网让政治参与获得了复兴，但并不是发动了一个政治从“旧”到“新”的转移。传统政治已经重新思考了其传播模式，并因此在年轻人的网络政治参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⑩

这一问题让我们既超出了对正式国家政治的考虑，也超出了政治的公共性和私人性面貌的讨论范围。前者主要聚焦于宪政问题，而后者允许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用权的地方参与。这就提出了有关教育活动的场所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或者至少是学校教育）是一种非常公共的活动，但通常会强烈地（或专门地）聚焦于单独的封闭活动。博客的撰写与分享、维基网站、电子档案和电子化社交网站完全依赖于他人。有时，其他人的参与仅限于担任一个听众的角色（“潜水者”这个相当令人不快的术语，就是用来描述那些只停留在看的层面，但对社交网站没有积极贡献的人），或许可以说那种断断续续的监督式参与也是有价值的。^⑪一个网络需要积极的参与者，在“一个公共论坛，观念形成、提炼、应用和修订的逐步积累过程，对于学生同辈和老师们而言都是完全可见的”。^⑫那种公共论坛主要依赖于做什么和怎么做，但是它与公民参与之间的明显联系也是不容否认的。

（三）公民参与的实践

随着社交媒体的使用，学习与行动之间的鸿沟可能会缩小。这不是说二者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被探索过。例如，韦伯（Webb）在政治教育上用一种很有价值的方式对反纳粹联盟的教育能力做了探索。^⑬服务性学习已经是一种确定的方法^⑭，而且仅仅是公民参与教育的众多初步举措之一，这说明我刚刚提到的鸿沟并不是普遍的。一般而言，教育者总是很乐意看到积极的、具体的活动成果：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自尊心得到了提高，学习的动机更强烈了，学习行为在活动中发生了。但通常情况下，年轻人在学校获得的实践成果，不如他们在参与活动中获得的学习过程那么重要。其中一个原因，即科瑞克在设计公民教育国家课程时热衷于强调行动反思，是为了避免对志愿者活动的过度关注，这一现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出于推动公民教育的意图而产生。我们要把科瑞克的这种保留态度与教师们面对的其他限制结合起来看。

⑧ Heater, D., *World citizenship: cosmopolitan thinking and its opponents*, London, Continuum, 2002.

⑨ Merien, S., Hooghe, M. & Quintelier, E., Inequalities in non-institutionalised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multi level analysis of 25 countries. *Political Studies*, vol.58, 2010, p.187.

⑩ Calenda, D. and Meijer, A., Young people participation and the interne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vol.12, no.6, p.879.

⑪ Papacharissi, Z., *A Private Sphere: Democracy in a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⑫ Boettcher, J., Ten Core Principles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sights from Brain Research and Pedagogical Theory, *Innovate*, vol.3, no.3, 2007, http://www.coulthard.com/library/Files/boettcher_2007_tencoreprinciplesfordesigningeffectivellearningenvironments.pdf.

⑬ Webb, K.,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n Anti-Nazi league*, University of York unpublished MA dissertation, 1980.

⑭ For example, Strait, J. R. & Lima, M (Eds.), *The Future of Service Learning: new solutions for sustaining and improving practice*, Sterling, VA, Stylus, 2009.

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支配那些政治教育推动者的灌输^①,和导致禁止党派性教育立法(1986 年首次引入,在 1996 年重新合并到了教育行动计划)的教条之间的争论,会让老师们在被要求更加重视从行动中学习时更加犹豫。促进公民参与的任何鼓励与借助社交媒体的参与现实之间的逻辑,似乎表明需要一个更大的教育焦点。如果社交媒体的发明可以用来从学习中一定程度地偏转参与的天平(改变参与在学习中的地位),那么教育者就可以选择忽视它,还是与它一起努力——既要避免没有思想的行动,也要避免没有行动的思想。剩下来的是一个由社交媒体带来的新环境下的挑战,即在公与私、正式与非正式的界限模糊之后如何教育,在不民主的环境中如何教育为民主的学习而参与。

如果上述的讨论有意义的话,那么教育学的许多方面都需要详细的考虑。看起来聚焦于在传统背景中通常被认为具有挑战性的东西是很必要的。这意味着有关这些公共论坛的评估有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金肯斯(Jenkins)指出,在线协同工作的其中一个意义就是教育者需要重新思考评估的个人主义基础。^②现在已经有大量的评估工作可以应用到社交媒体和公民参与方面。关于学习评估的整个争论^③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许多科目如戏剧和技术中应用的积极技术;在公民教育中已经存在的小组项目可以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在参与者的相互作用包括听众的表演中找到新的学习形式。

综上所述,关于公民参与、社交媒体和教育的问题是高度复杂的。但我在本文中已经尝试做出了一个积极的论断,认为好工作是可以产生的,而且认为我们需要把努力的重点放在与公民参与的目的、地点和实践相关的问题上。在未来的十年,教育的面貌可能会被彻底地改变。现在是时候小心地思考、慎重地工作,看看我们是否可以为未来做出贡献。

[本文由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代波、万勇华翻译,特此致以谢意]

(责任编辑:周奇)

① For example, Porter, A., Political Bias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olitics*, vol.15, no.3, 1986, pp.371—386.

② Jenkins, H.,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 Black, P. and Wiliam, D.,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vol.5, no.1, 1998, pp.7—74.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Civic Engagement, Education and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Ian Davies

Abstract: I argue, based largely on reflections from the UK, that there is educational potential in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helping young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society. I make this argument cautiously by suggesting that there are very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clarified before we can move towards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that positive potential. Following some introductory general remarks about the meaning of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the potential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educational contexts, there are 3 main sections to this article. Firstly, I discuss perspectives about participation by referring to key traditions, areas of activity, the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lead to participation and the location of that involvement. Secondly, I explore perspectives about participation and social media that are relevant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individual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to the nature of learning. Thirdly, I draw together the threads of what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by referring to theoretical models for participation raising implications about educational policy, curricular practice and teacher education. I suggest that there are several areas of research that are needed.

Key word: civic engagement, social media, education, connection